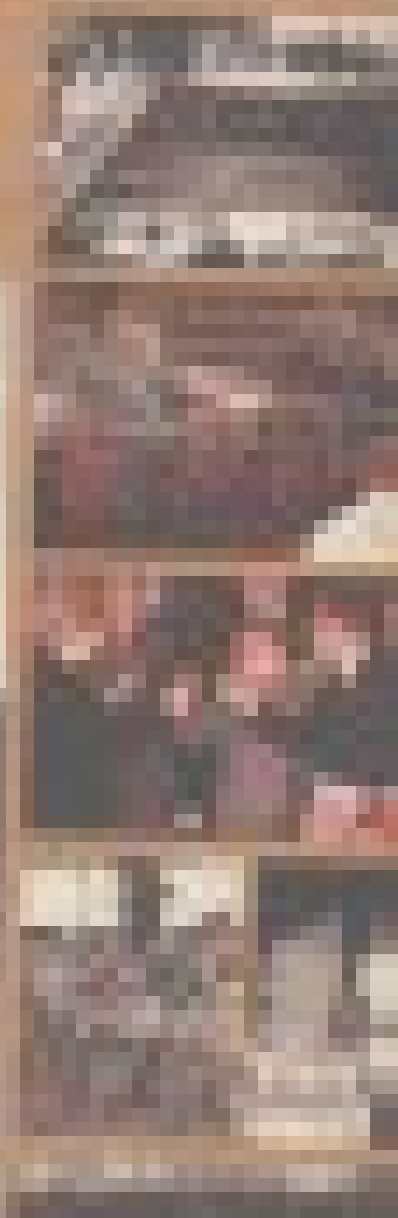


钓鱼台 档案

红旗出版社
第 3 卷



钓鱼台档案



钓鱼台档案

《钓鱼台档案》编写组

• 第三卷 •

红旗出版社

百年恩怨缠结 心系香江

——中英关系曲折历程

7

卷一

第一章

紫石英招惊魂事 杜维廉来建半交

第一节 英炮舰溃败而去 丘吉尔报复不成

没有美国人的援助,英国就会“实际上破产”,因而英国人不敢得罪美国,但英国在中国又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何况还有香港这颗“英王王冠上的明珠”。在东方,英国同样不敢同中国硬抗。在美、中激烈对抗的时代,英国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

英国和中国在二战后仍摩擦不断,英国提出的各国分配日本赔偿的提案中,英国所占的比例竟是中国的两倍!英国一手导演了西藏分裂分子“驱汉”的闹剧,又教唆尼赫鲁继承其衣钵。

渡江战役时,英舰横加干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专员闻听“紫石英”号事件后,连说了三个“愚”字。两艘军舰带着浓烟和累累弹痕,狼狈不堪地朝上海方向溃败而去。

丘吉尔挥着胖胖的拳头狂妄叫嚣,要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报复;毛泽东反问:“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

英国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干涉

○ 美、英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日本投降后,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蓄意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也就是妄图使中国继续沦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力争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也必须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狂图做好充分的准备。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终于在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支持援助下,悍然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武装力量的内战。历经4年艰苦斗争,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中国人民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不仅需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还需要排除美、英等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继1945年5月初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的中、美、苏、英4国外长会议后,同年12月16日至26日,苏、美、英3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出席了会议。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宣称,“渠等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渠等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苏、美二外长对于两国军队应在合乎完成任务及责任的条件下,尽早撤离中国一事,彼此意见完全一致。”美、英等国标榜的是“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可是却只能“同意”中国在“国民政府下”,言外舍此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历来以民主国家自诩的美、英,最值得自豪的是国民直接投票选举政府,然而,对于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却要赖于渠等的“同意”,而且只能同意对于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蒋介石政府对中国的继续独裁统治。其实,在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召开前1天,杜鲁门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中就已定音。他说:“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惟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又说:“除非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完全祛除,又除非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与和平的国家,则太平洋上和平的维持即使不被破坏,可能受到威胁。美国暂时在中国保持其陆、海军,其目的即在于此。”按照3国外长会议公报的说法,美、苏两国军队继续留在中国是为了“执行日本之投降条件,解除日军之武装及遣送回国”,后来事实证明此说不确,美国为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内战,在早已完成该项任务后,不仅食言拒不撤军而且还大量增兵。此外,据新华社统计,自抗战胜利至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1948年3月,美国援蒋的战争物资及贷款总计达46亿美元以上,加上抗战时期援蒋的15亿余美元(大部分被蒋介石留充内战资本),合计共62亿美元以上。直到1949年,蒋介石集团被迫从大陆撤退时,美国陆、海军才不得不撤离中国大陆。至于苏军从中国东北撤走的时间,也不是3国外长会议公报上写的,“询中国政府之请求,已展期至(1946年)2月1日”,而是借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苏军已大批开入东北的事实进行追认,而且对苏军撤离的期限也未明文规定,苏军延至10年后的1955年才从旅顺、大连撤离完毕。

英国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战后又全面急剧衰落,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外交上自然也要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战争中英国军民死亡人数,按德国统计为386000人,其中62000为和平居民。战争中军费损失达1200亿美元之巨。1945年8月,英国财政部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实质性的援助,英国就面临着“财政上的敦刻尔克”,将是“实际上破产”了。战争中英国外债猛增,从1939年8月47600万英镑,到1945年6月增至355500万英镑,债权国就是美国。英国战前储备的大部分黄金和美元流失,因向美国大笔举债,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对外出口贸易也剧降至仅及战前1/3的水平。战后英国工业生产恢复发展的速度远落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生产增长率较低的国家之一。由于经济上的困境,战后英国失业人口与年俱增,国内政治危机也日益加深。战后美、英在中国问题上,首先

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充分发挥有限的运载工具的效率,尽快将大批国民党军运送到各地抢先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武器抢占地盘,准备好打一场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根据12月19日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谈话备忘录记载,贝尔纳斯对中国华北形势的“复杂”感到忧虑。华北有30万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军,而蒋介石政府却没有足够的军队去接受华北日军投降。将缴械后的日军尽快遣返回国,也缺乏足够的运载工具。另外,在华北尚未组成正规军的革命武装约有40万人,而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却仅有10万人。蒋介石政府已将大批军队空运、船运往东北,集调军队增援华北需要时日,美国才将海军陆战队留在华北。贝文虽然“尚未研究华北形势的所有详情”,但是他感到“当着当地的骚乱妨碍迅速实施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我们三个强国应施加我们的影响来克服这些骚乱,以便有可能实现有关日本人投降的主要目标”。显然,贝文比贝尔纳斯对华北形势的忧虑更前进了一步,他将人民军队理应接受日军投降的举动诬为“骚乱”,而且摩拳擦掌地要来“克服这些骚乱”。当然,当时真正有力量帮助蒋介石集团准备反革命内战的只有美国,而英国虽然力不从心,态度却是十分明确的,紧跟美国彼呼此诺,有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态度明确外,英国当局更有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准备内战的实际行动。除港英政府自1945年8月起两年内,协助船运10万国民党军从九龙到北方反共内战前线外,早在1944年11月3日薛穆大使就直言不讳地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声称,英国政府以及他本人都不赞成美国扶持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政策。英国方面预计,由于国共两党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势将持续动乱,一时不可能实现统一。退一步讲,即使中国实现统一,任何促成其统一的政策也必定是错误的。因为,统一的中国只会在远东“引起麻烦”,而且“将意味着未来年代里在东方消灭帝国主义,而白人在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总之,英国不希望看到战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强盛,这是英国维护和扩大在华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见,战后英国重占香港,助蒋运兵北上,叫嚷要直接插手“克服”华北的“骚乱”是必然的。如果说,美国 and 英国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方面有什么不同的话,即美国至少在口头上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发誓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英国则不愿多讲信誓旦旦的不实之词,只是为维护 and 扩大其在华权益更加毫不掩饰,更加务实重行。

○ 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经济依据与对日索赔的表现

战后英国对华政策不仅是消极地追随美国,更重要的是根据英国自身的需要制定的,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根据其本国利益的需要,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需要制定的。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贸易部以及其他官方的与非官方的部门讨论战后中国问题时,总是着重研讨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这是制定各项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对于英国制定和执行对华政策影响甚大的英商中华会社总干事古尔(E. M. Gull)在1943年4月就提出对中国采取短期的展望(例如展望10年)“很肯定是个好的看法”。直到1946年10月,也就是英国正处于战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即“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麦高恩(Mc Gowan)在英中商会仍持与古尔同样的看法。他表示渴望英中“恢复相互换货和贸易”,如有机会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将继续其战前在华的商业活动。麦高恩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是英国在华进行完整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投资就先需要有不动产占有权的安全和健全的政府”。他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金融方面的法

令,特别是有关外汇管理的法令,都是外国在华投资和从事其他商贸活动的障碍。他相信,只要中国的劳动报酬、原料价格与供应,以及市场价格间尽快地协调和稳定,中国轻工业复兴的前景是很好的,麦高恩特别看好中国东北和台湾在中国经济恢复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他还表示“英国与中国有持久的友谊,将尽力把这个国家从迄今尚在盛行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将参与政府“拯救”中国的政策,因为“中国经济的恢复有助于全世界”。除麦高恩为代表的英国大企业的头面人物外,同中国恢复和发展贸易也是英国商人的普遍愿望,英商中华会社 1946 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英两国间的利益一致,各自对对方产品的需求,以及两帝国间友谊和商业往来的悠久传统,无疑将在条件许可时引发出活跃的商业复兴。”报告多处提到恢复一个多世纪以来盛极一时的由英国转口为主的中国茶叶贸易是大有可为的。此外,蚕丝、猪鬃、皮革、锡、钨、人发、羽毛、驼毛等中国传统出口产品也是英国大量需要的,报告抱怨战争末期政府没有采取及时而有效的步骤,例如派遣一个旨在保护英国的利益和资产,熟悉中国情况的代表团赴华。英国政府暂时没有采纳中华会社的建议立即采取什么步骤,只在同年年底审议了这个建议。其实,早在 1944 年底英国贸易部就议过派遣商业代表团访华的必要性,评议强调代表团的使命应完全是试探性的,而不是为了销售英国商品去中国远征。贸易部呼吁,英国应该研究有关影响外国人在华经济活动的中国新出台的法规,例如公司法、保险法、土地法等。还应该调查研究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比如中国总的金融地位、海关、政府专利权、进出口贸易、自然资源、工业发展、交通运输等。最后,评议强调英国贸易部派遣商业代表团赴华就是要显示英国“对华贸易是有兴趣的和积极的”,以利政府教育和感知商人们,政府从未忽略过中国市场。甚至可以说,政府将中国看作是“有利可图的商业企业的战场”。

英国外交部经济与工业计划课 1947 年 1 月提出的一份报告称,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直接对华商业投资总额估算约 12400 万英镑(战前的币值,不包括沿海和岛屿间水运装运价在内)。其中约 1000 万英镑是不动产和包括全部土地及建筑物的价值;约 1400 万英镑是动产,如公债、机器和设备,以及私人财物的价值。从该项商业投资的获利中,平均每年汇往英国约 400 万英镑。英国对华商业的再投资中,一部分是代以厂房、设备,以及其他购自英国的材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打击。战争使英国在华物质财富遭受的损失估计约达 13700 万英镑,75% 的动产被毁坏或搬迁。要恢复战前在华的经济地位,英国首先必须与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建立新的更全面的接触。继 1946 年英国贸易部商业代表团访华后,1947 年 9 月 29 日以安蒙勋爵(Lord Ammon)为首的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行前对英国朝野关心的中国各方面情况集中做出分析和衡量,并分发给代表团成员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第一手详尽资料。这就是说,英国朝野人士对于仅着眼于恢复和开拓对华商贸关系的做法已经提出质疑,即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英国商人们仍保持旺盛的传统期望,就必须不仅从商业方面,而且从政治方面着手恢复英国战前在华地位。1947 年 8 月 7 日出台的英国贸易部官员胡珀(H. O. Hooper)备忘录强调,如果英国想要使任何对华商业活动的计划有效实施的话,就必须是在“稳定而和平的中国”条件下才能实现。胡珀认为,英中贸易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事实上出口商冲破阻碍卖给中国的商品比卖给指望硬通货的市场还多。他强调,英国出口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英国政府是渴望激励起

一股强劲有力的对华出口贸易浪潮的,然而“直到我们的硬通货地位得到改善以前,我们还不能鼓励对华出口”。胡珀备忘录在战后英国对华商业政策的阐述中,注意区别英国在华贸易和英国对华贸易两个范畴。他认为,政府即使还不能鼓励但至少应该保护对华贸易,由于战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在华贸易已不可能继续了。胡珀备忘录强烈地表达了重现战前英国在华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愿望,然而,实现几与世纪同龄的“梦”,对英国来说谈何容易,英国抓住战后全球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机固已不易,利用时机再现“辉煌”显然更是力不从心了。

战后英国国力式微,在远东显然已有即将被美国取代其战前地位的趋势。因此,如何保住至少是不太多地失去英国在华既得的经济地位,是英国政府也是英国商人殚思竭虑的难题。为保障在华既得的丰厚利益,从英国政府到商人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必须有和平的环境、健全的政府和稳定的经济。也就是说,英国支持的中国政府只能是有力量控制中国的局势,间接代表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利益的政府。战后初期,英国打算支持蒋介石政府克服“骚乱”,正是为实现这个目的的曲折反映。当然,英国当局一向轻视蒋介石及其政府,并不相信他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混乱的中国,不过一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加以英国当局反共心态根深蒂固,这就是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经济依据和政治目的。

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中、美、英、苏、法5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根据《波茨坦宣言》的有关规定,讨论处理战后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盟国远东委员会,规划实施日本投降条款的各项政策,会议并考虑成立盟国(中、美、英、苏)管制日本委员会。此后,盟国远东委员会规划实施的日本投降条款包括:严厉惩治日本战犯、军事占领日本问题、战后日本国家制度、战后日本领土问题、赔偿战争损失以及相关的海外资产问题、对日和约问题等。其中最敏感,最能检验相关国家掌握和履行国际关系准则的问题是赔偿问题。1947年10月25日,同盟国各国联合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共计540亿美元。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时据南京政府(1946年5月1日已还都南京)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财产损失约580亿美元,人口直接死亡约1100万人,间接死亡尚不在内。赔偿问题涉及广泛,各方的依据和要求差距很大,不易形成一致意见是事实,但各方在提出索赔要求和分配赔偿比例时,应率先遵循公正的、客观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国代表提出中国人民受害久、牺牲大,在各国分配比例上应占40%。英国要求占25%,美国要求占34%,苏联要求占14%,法国要求占12%,澳大利亚要求占28%,加上其他各国合计为204.5%,超出一倍以上。各国又分别提出总额分配比例的方案。苏联提出:中国占23%,美国占15%,苏联占14%,英国占5%,法国占3%。各国认为苏联要求过分不切实际,而且分配失当。美国提出:美国占32%,中国占29%,英国占8%,苏联和法国各占2%。显然,这个分配比例方案也是由美国得利出发,难以被各国接受。英国提出:美国与菲律宾合占32%,英国占25%,中国占14%,苏联占2%,法国占1.5%。这个分配比例方案除明显讨好美国外,就是为英国一己之私弃公正与客观于不顾的典型了。中国提出:中国占40%,美国与菲律宾合占30%,英、新、加、印、澳合占20%,法、苏、荷合占10%。中国代表强调指出,依中国抗日战争的损失和贡献看,赔偿占40%已是谦让,不应再少。会上,中国代表愤慨地质问英国代表,将中国占的比例压缩至14%的根据何在?提出“未知英方代表可否提出中国之损失及贡献之数字”?“中英两国统计上的比较如何?”英国代表无言以对,只好托辞考虑后再作答复。其他各国也一致认为英国

占 25% 比例太高,殊不合理。中国代表还建议,先行分组派定份例,再由各组内部商洽订定其份额的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为多数受赔国所接受。中国虽然在抗日战争中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但盟国各方对中国代表的意见并不重视。各国代表只同意中国占 30% 左右,结果争执不下,议而不决,对日索赔问题遂成历史悬案。后来,从 1948 年 1 月至 1949 年 9 月,中国先后派船 22 艘次由日本运回赔偿设备 12504 箱,重 35912 吨。包括发电设备、起重机、各类金属货币,以及被劫的图书和文物等。据南京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中国得到的象征性赔偿仅约值 2250 万美元,与委员会估计的财产损失 580 亿美元相去太远,况且中国实际所得还远未达到这个数字。直到 27 年后,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国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并决定立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

○ 英国干涉和侵略西藏的新手法

在西藏问题上,英国历来居心叵测,迭谋侵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甚至唆使西藏少数上层分子策谋分裂祖国。1933 年底,一度亲英并与当时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很大保留的达赖十三世圆寂后,英国加紧干涉西藏,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处”并附设电台和医院。1940 年,年轻的热振活佛在谣诼的压力下避灾静修,英国控制下的大札活佛开始摄政。大札素来排斥异己,背信弃义,勾结英印策谋西藏独立。在英国挑唆下,后来大札控制下的噶厦地方政府派藏军将热振从静修的色拉寺拘回拉萨,并炮轰保护热振的色拉寺,战斗经旬,双方战死 300 余人,色拉寺僧军战败,热振活佛遭毒毙。在战斗中,英国报务员架设电台为藏军保持通讯。抗日战争中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期间,重庆政府本拟开通由四川经西藏连接印度的国际通道,但又遭英国的破坏而未果。1941 年 9 月,中国测量队携带大批测绘器材入藏测绘通藏公路。西藏噶厦在英国代表处官员的挑唆下,借口民众大会决议,坚决不许测量人员入藏。英国当局在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不仅屈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关闭滇缅公路 3 个月,而且乘人之危为进一步控制西藏,极力阻挠和破坏重庆政府与西藏的一切联系。不仅如此,英国还俟机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制造西藏“独立”。1943 年英国在西藏的最高官员是 1 名英军少校,他除指挥西藏各要地的英印驻军,设立电台、医院和学校外,其特务情报网遍布全藏各地,这名少校俨然以英国驻藏的“太上皇”自居。

1942 年冬,中英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时,英方顽固坚持不放弃在西藏的特权,而且更变本加厉地煽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搞“独立”活动。在英人煽动下,西藏噶厦以公众会议(即西藏僧俗民众大会)的名义,呈请大札摄政设立藏政府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外交局”。1942 年 7 月 7 日“外交局”正式成立后,噶厦通知重庆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外交局”洽办,这就等于宣布西藏今后与中央的关系变成“外交”关系了。“外交局”甫告成立,英国、尼泊尔驻拉萨代表为营造正式承认这个西藏“外交”机构的气氛,立即与其发生关系。但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认为“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在英国唆使下,噶厦以种种卑劣手法诱使驻藏办事处与“外交局”发生联系,但办事处始终未与“外交局”

往来。为此,重庆政府向西藏噶厦提出警告,如仍坚持不改一意孤行的话,中央就要出兵解决。1943年5月12日,蒋介石召见西藏驻重庆代表时严词提出:驻藏办事处向藏洽办事件必须与噶厦径洽,不经“外交局”;协助修筑中印公路;协助办理驿运等5项条件要求藏方遵守。同时,在青海、西康等地进行军事调动以示警,噶厦迫于形势不得不妥协让步。此后,西藏“外交局”只作为地方的外事机构存在,西藏“独立”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外交部拟就方案,相机与英国政府谈判完全废除其在西藏的特权。但是,英国当局非但拒不放弃,反而继续挑唆西藏与中央的关系。1947年10月,噶厦地方政府派出“商务考察团”前往美、英等国活动。据驻藏办事处报告,所谓“商务考察团”赴美、英等国的任务主要是采购“独立”时使用的新式武器。报告还指出:“最近藏政府更受英人之暗示,拟收复康定(打箭炉)以西各地,成立大西藏国。待该商务考察团赴英美购得武器并呼吁西藏独立局势明朗后,即准备举事。”可见无论如何伪装,“商务考察团”赴欧美活动的真正目的业已昭然。同年冬,“考察团”进入印度,印驻孟加拉总督接待该团时却排除了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当时中国驻印大使罗家伦会见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谈到中印关系提出,要求禁运英国军火武器进藏,并请印方不得承认西藏地方自行发放的护照。尼赫鲁表示,在印度购买军火武器很容易,西藏“考察团”是否已购买尚不清楚,须调查。藏人入印无需护照,至于赴英签证不属印度政府办理。他还强调,西藏是中国的自治领土,英国承认的仅是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言外宗主权以外的事情,中国政府就无需多虑多管了。“商务考察团”在美国的活动一无所获,原准备拜会杜鲁门总统面呈达赖的信函,最后只好请国务院转交总统。“考察团”接着乘轮赴英,英国政府以英藏曾订立协定,向有往来,应善待礼遇为由,艾德礼首相接见了“考察团”。最后一站是意大利,意政府通知“考察团”,办理各项事务须申请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介绍办理。也就是说,意政府拒绝与中国驻意外交机构以外的任何机构或团体直接发生接触。这次噶厦地方政府派团赴欧美之行谋求对其“独立”活动的支持和援助,结果除英国当局别有用心外,其他国家表现冷淡,显然这次出访“考察”以失败告终。“商务考察团”只好凄然电告噶厦称,“所谋向外贷款贸易,及企图使西藏独立事,均未如愿以偿”。

英国战后国势衰颓,虽然回天无术,但图谋继续侵略控制西藏的野心却并未稍戢。1949年7月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英殖民主分子、屡次策动西藏独立的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N. Richardson)又一手导演了“驱汉”闹剧。大札摄政在上层藏官的秘密会议上,传达理查逊的密示:值此中国政局大变化之际,应立即将汉人驱逐出藏,否则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强调必须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在一片反共鼓噪声中,噶厦调集大批藏军集中拉萨,“驱汉”丑剧在降神驱鬼的法事中开场了。同时,噶厦致电在广州的代总统李宗仁,指出:“为西藏佛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人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西藏民众大会特请中国代表及其随员、无线电报员、学校教师、医院工作者及一切其他可疑之人,必须在规定期间内,各自返回其原籍。”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接到立即出藏通知当晚,藏军包围了办事处,交通部、教育部驻藏机构,甚至中央气象局及附设的电台、拉萨小学等也被包围,藏军分3批押送40余名各界汉族工作人员,经锡金逐出西藏。“驱汉”事件发生后,7月27日英国新闻媒体立即散布谎言,说什么“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辖的说法”。同日,有的英国人还扬言“如局势演变竟至影响1914年

中英所订《西姆拉条约》中承认之西藏自治权时,英国可能出面干涉”。一唱一和还是老调重弹,即在反共的旗帜下继续破坏中国的统一,策动西藏的所谓“独立”。

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唆使和支持下,妄图重演 37 年前辛亥革命时的“驱汉”事件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不会重演,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英国再企图制造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隔离,挑拨离间汉藏人民的团结只能是徒劳的。从晚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英国对我国西藏的干涉和侵略从未歇手,其侵略手法是诡计多端的,留下的祸患和影响是深远的。旧中国时代英国干涉和侵略西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英国干涉和侵略中国历史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才得到可靠的保障。

○ 英国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罪证——“紫石英号”事件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投靠美国,1946 年 6 月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最终消灭中国共产党,寄望于美苏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期最后解决“国际共产主义问题”。岂料内战全面爆发仅 1 年,人民解放军就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在各条战线上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项基本政策,并重申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国民党政权在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打击下,内外交困摇摇欲坠,但仍一面调整军事部署负隅顽抗,一面加紧向美国乞怜求援。1948 年冬,国民党政权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南京政府被迫进行“改组”。12 月 28 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会见行政院副院长兼代外交部长吴铁城时,吴铁城受命表示政府准备考虑接受“光荣的和平”,并试探请求美、英、苏、法 4 盟国出面调停国共间的战争。司徒雷登为给国民党政权鼓劲,表示美国决心反共,准备适时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对于“调停”国共间战争一事,因已有 1946 年“调处”失败的先例,因而很“困难”。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免遭灭顶,除于 1949 年元旦抛出一篇虚伪的“求和”声明外,1 月 8 日又令吴铁城分别照会 4 盟国驻华外交使团。宣称他的政府“一贯致力于寻求国际和国内的和平……尽速恢复和平成为当前的急务”,已准备通过国际调停“开始与中共谈判”,“民国政府兹向各有关国家的政府保证,它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的诚恳愿望”。鉴于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连美国政府也决意不再充当蒋介石的意外“救星”。美国政府在 1 月 12 日的复照中,回顾了“曾贡献其充分努力”调处国共停战但终致失败的往事,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英国复照称,英国“对目前阶段的斗争进行干涉,除了违反莫斯科宣言(按指 1945 年 12 月苏、美、英 3 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外,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因此英国政府抱歉地决定拒绝干涉。”一俟中国恢复和平进行重建时,英国则将“尽力协助”。苏联复照重申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认为“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无需外国干涉”。法国对中国事务本无心过问,也复照表示无能为力。各盟国婉言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请求,除失望、轻蔑和丧失信心等共同的原因外,也有各自的原因。就英国而言,当然也并非真的出于信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英国野蛮干涉中国

内政的历史已逾百年,不顾国际承诺背信弃义的事干得还少么?何以这时却又要言信行果起来呢?其实,在国民党政权即将最后垮台的时候,英国当局主要考虑的是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后,如何保障其在华既得利益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英国政府表示要“尽力协助”中国重建,也就是摆出一副今后愿与共产党政权“合作”的姿态。新中国诞生后,英国是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进一步印证了这时英国“拒绝干涉”的真实原因。

当然,英帝国主义势必顽固坚持反共、反民族独立的立场,也决不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一手制造了企图破坏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紫石英号”事件。

迄1949年1月,国民党军在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中已彻底战败,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老巢南京危如垒卵。1月底,国民党政要们纷纷离宁赴沪,2月初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4月20日,正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蒋介石欺世惑众的假和平被彻底揭穿时,在长江上镇江、江阴段的人民解放军正在积极准备渡江作战。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伦敦号”、“伴侣号”和“黑天鹅号”与国民党海军军舰相伴,驶入我军防区游弋。21日下午,在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指挥的东路军第23军渡江前,“紫石英号”等舰竟再次从长江上游向我战区驶来,显然是对我军渡江作战进行阻挠。约下午4时半,离渡江作战时间仅剩1小时,第23军军长陶勇请示叶飞司令员,是否驱逐我军渡江地段对面江上2公里游弋的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叶飞司令员考虑离第10兵团启渡只剩半小时了,不容迟疑,遂命令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示警,命令这些军舰迅速驶离我军防区,否则即将发炮驱逐。但是,“紫石英号”等舰未对我军发出的信号作出任何反应,反将舰炮转向我军阵地。叶飞只能下令开炮,我军榴弹炮6团和部署在长江北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与敌舰的炮战。一时长江江面水柱腾空而起,硝烟漫卷万顷波涛。激烈的炮战中,我军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18艘,“紫石英号”被击伤在镇江附近江面搁浅后被解放军俘获,其余3艘英舰被击伤后向长江下游逃逸。炮战中毙英军46人、伤82人,我军伤亡252人,第23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邓若波团长也在这次炮战中牺牲。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声明,严正驳斥英国朝野污蔑我军的种种滥调。保守党领袖、前首相丘吉尔4月26日在英国议会下院的发言中,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卫反击英舰的正义行动是什么“暴行”,狂妄叫嚣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我声明指出“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么?”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在议会下院就“紫石英号”事件发表讲话。他说:“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他竟造谣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他还告诉议员们,英国驻华外交人员一直在努力与中共政权建立联系,但未成功。到目前为止,在中共占领区尚未发生侵犯英国公民的事件。总部声明继续指出:“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声明还严正

指出“、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在英国议会中，保守党议员很少批评执政的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当“紫石英号”在中国长江上被炮击、搁浅、被俘的事件发生后，议员们才发现他们过去对中国事务关心太少了。因此，保守党议员批评政府为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派“紫石英号”驶往南京附近江面，指责政府对“紫石英号”保护不够。

为“紫石英号”获释，英国当局指令远东舰队司令通过“紫石英号”舰长与人民解放军代表进行了11次谈判。解放军代表要求英方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才能考虑释放“紫石英号”。然而，英方始终狡赖，故意拖延，拒不承认侵略罪行。7月30日夜“紫石英号”趁着“江陵解放号”客轮经镇江下驶的机会，强行靠近该轮与其并驶，并不顾我军令其停驶的警告反而开炮向我军射击，仓皇逃遁中还撞沉我民用木船多条，直至逃出长江进入公海。“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当局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遭致可耻失败的铁证。

○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英两国是反法西斯盟国关系，但是战后大量事实表明，英国对华政策仍然背弃国际信义，执意奉行干涉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帝国主义政策。战后英国是一个江河日下的西方大国，却又极端顽固地坚持其在华殖民权益。它使用的手法，既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宗教的、民族的；既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既有利用矛盾、制造分裂，也有直接出兵，野蛮干涉……总之，千方百计地要在中国留下英国的影响和势力。

中国虽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确是百年来西方列强侵华的元凶。英国不甘心放弃任何在华权益，正是英国面对战后蓬勃发展的殖民地、保护国、占领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既惊慌失措，又不甘心失败的矛盾心态的必然反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战后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不甘心失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必然要本能地跳出来直接武装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3个月，英国政府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显然表明英国是绝对不愿失去中国这个极富潜力的市场的。历届英国政府渴求扩大对华贸易，然而在许多国际事务和国际场合中却又不断反华。这一切，貌似矛盾而诸多现象背后事物间的本质性联系和发展却又十分合乎逻辑，即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英国在华的一切利益。

（萨本仁 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

英舰“紫石英”号事件

○ 炮击英舰

1949年4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同志为书记的总前

委统一指挥下,沿西起鄱阳湖口东至江阴要塞的千里长江北岸,积极准备渡江作战。

4月20日晨,炮三团团长李安邦同我(我当时任团政委)前往扬州八兵团司令部参加渡江作战的会议。约9时,从三江莹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炮声。稍后,炮三团用电话驶过我三江莹左翼的炮位,我向英舰开火,英舰也向我阵地还击,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战。英舰中弹30余发,悬出了白旗驶向南岸,停靠在我阵地西南约7000米处。

下午1时30分,三江莹方向又传来了炮声。另一艘英舰从上游顺流疾驶增援受伤的英舰,同我炮兵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英舰连续中弹五发后,全速下驶脱离我火网,然后又掉转舰头沿北岸上驶,利用我野炮阵地的死角,击毁七连野炮两门。该舰继续上驶时遭到我一连榴弹炮的迎头痛击。英舰又连中数弹,被迫回头下驶。

这时,南京政府已经公开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决定于4月21日强渡长江。我们赶回三江莹后,看到英舰船舷髹有英国国旗,编号F116,船名看不清,但指挥台、尾炮塔及船身多处中弹的裂口斑斑可见。英舰泊近南岸,估计是在指挥台中弹后航向失控而搁浅。

傍晚,外电报道了在长江肇事的英舰是“紫石英”号(AMETHYST)和“伴侣”号(CONSORT)。紧靠国民党炮兵阵地的“紫石英”号,这时已降下了白旗,该舰的位置严重妨碍我步兵的渡江和登岸。因此,二十军指挥员要求炮兵迫使该舰移走。七连向“紫石英”号发炮后,舰上升起了爆炸的浓烟。当时江水也受到晚潮的影响,“紫石英”号被浮起缓缓移动,然后消失在薄雾飘逸的水天之际。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号和“伴侣”号在长江内先后受伤的报告后,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立即乘坐旗舰“伦敦”号(LONDON)并率驱逐舰“黑天鹅”号(BLACK SWAN)全速驰援。4月21日晨,英国舰队驶过了江阴继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江面前进。英舰密切窥察我军阵地,舰上的巨炮一齐指向北岸。

早在北岸待命的特纵炮一团向英国舰队鸣炮示警。英舰自恃船坚炮利,不仅置我警告于不顾,而且向我猛烈轰击。于是我沿江炮兵齐向英舰开火,霎时间英国舰队纷纷中弹,“伦敦”号带着累累的弹孔和伤痕溃驶上海。

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根据英国海军当局的情报,初步报道了英国海军的伤亡:“紫石英”号死亡17人,重伤20人,60人溺水登岸;“伴侣”号带回死者10人,伤者12人,前炮两门被击毁;“伦敦”号已将死者15人和伤者13人载抵上海;“黑天鹅”号7人负伤。

○ 声震英伦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的4月20日和21日,四艘英国军舰竟连续同待命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爆发了猛烈的战斗。这种难以想象但竟突然出现的武装冲突,引起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并成为当时国际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焦点。在英国更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强烈批评和质问,反对党和执政党更是舌剑唇枪,争论不休。

英国官方对“英舰长江事件”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最初只是公布了“紫石英”号被“敌对”的炮火击伤,甚至连炮弹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未指明。4月21日,英国驻南京大使否认他已向北平中共当局提出抗议,只说“沿江部队未接获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

英国国会议员、海军中将泰勒5月5日在下院辩论“长江事件”的一段讲话中说:“你不

能走到那些已经摆脱腐朽和帝国主义枷锁而正在奋勇前进的人们面前说：“……我们将派遣一个使者与你们建立联系，他将会通知你，我们要你们做什么。”

英国下院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激烈。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对4月26日首相艾德礼所谓“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的声明进行了反驳；对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报复”的狂言，和对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关于英舰留在南京有利于供应、无线电通讯、和护侨等诡辩，展开了争辩。

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已为1943年的条约所废除；至于“国民政府”的同意，那个即将放弃南京且随即迁往广州的政府曾经警告我们说，“往后实行那项承诺是有困难的”。

议员们批评政府不该把军舰留在长江。罗伯兹议员指出，英政府在几个月前“曾经送给国民党好些军舰，这些军舰无疑地要被用于内战”。他追溯到历史背景说，“一百多年来英国军舰都常常卷入中国事件中，英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水内向中国人作战，到处引起中国人的愤恨”。因此罗伯兹认为，“在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以前几小时，英政府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行下驶”，“显然是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的愤怒的”。

一些议员驳斥派遣航空母舰为无稽之谈。维也特议员说，“空中掩护也是荒谬的”，这种办法今天已行不通了。“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而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地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了。但现在可不能再这样做了。”

麦克米伦概括地说，现在看来，“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

盖莱奇议员对英国报刊电台把“长江事件”归咎于共产党的炮手表示异议，他向国会提出质问说：“假若一艘亲希特勒的国家的战舰，在预定进攻日那一天（按指盟军登陆日）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

下院的那次辩论远远超出了“长江事件”而广泛地涉及到英国的对华政策。由于议员党派背景的不同，观点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对英舰当时并无必要冒介入中国内战之险而沿长江航行的问题，多数的意见是批评政府缺乏远见。

○ 百日谈判

炮击英舰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南京大使于4月23日首先派三等秘书尤德来浦口，试图同我军接触洽商救助“紫石英”号事宜。由于浦口不是我军主攻方向，没有最高指挥机关，尤德未能找到我方有权受理此事的人员。

我方也正在进一步调查“英舰事件”。4月24日，中央军委指出，炮击英舰事件已震动世界，指令有关部队迅速查明“紫石英”舰现状（当时只有该舰还留在长江），并报告各部队与英舰作战的详情。炮三团奉命南渡，准备参与研处有关“紫石英”舰问题。

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发表声明，斥责了丘吉尔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报复”的狂言，驱斥了艾德礼首相所谓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并要该舰“协助解放军渡江”的谎言。李涛将军申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道歉和赔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并愿意考虑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